

人權力量今猶在？* —— 螺旋模式與規範社會化的反思

顏永銘**

摘 要

1990年代，受到國際關係建構論的啟發，人權學界發展出自己的分析架構，1999年出版的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一書，讓學界認識到非物質取向的人權規範在世界政治中的積極角色。然國際人權規範在2000年以後的發展卻造成重大的經驗異例。本文介紹三位原編者於2013年出版的續集，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一書，來檢視螺旋模式積累的研究成果，以及修正後的理論框架，並進一步反思人權規範社會化文獻的挑戰與前景。本文認為，修正的螺旋模式架構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經驗異例，但卻未能針對自身核心的因果機制進行更深刻反省與調整，改良的螺旋模式仍有其局限，也無法真正涵蓋日益多元分殊的人權政治樣態。

關鍵詞：螺旋模式、遵從落差、限制性條件、人權政治。

* 投稿日：2015年9月1日；接受刊登日：2016年6月29日。〔責任校對：陳逸凡〕。

本文係作者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亞太地區的轉型正義：區域特質與普遍模式」(104-2410-H-039-001)部分成果之呈現，謹向獎助計畫之科技部與計畫審查人表達謝意。

**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穩定網址：<http://publication.ias.sinica.edu.tw/22800161.pdf>。



目次

壹、導言	肆、評價PPoHR
貳、問題意識：遵從落差	伍、重新思考人權規範社會化
參、螺旋模式2.0	

評論書籍：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Kathryn Sikkink, eds. 1999.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壹、導言

1999年，Thomas Risse、Stephen C. Ropp，以及Kathryn Sikkink三位學者合作編著了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 AND DOMESTIC CHANGE (PoHR) 這本對於人權研究領域影響深遠的著作。書中所提出的螺旋模式 (spiral model) 迄今仍是人權政治議題研究者重要的參照架構，十年之後，三位編者在懷俄明大學以及柏林籌組研討會，檢視螺旋模式的研究成果，並針對理論框架進行反思，期與千禧年後的國際環境變遷相互印證。相關會議與後續討論的成果，便是這本續集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PPoHR)。

對於人權研究者而言，1999年與2009年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間點。冷戰結束後的1990年代提供了國際人權運動推展的良好環境，配合著方興未艾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塑造了積極樂觀的氛圍。相較之下，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後續的反恐戰爭，讓國際人權運動進入衰退期，傳統支持人權理念的西方國家陷入「安全vs.人權」的兩難，而新興的開發中國家對於普世人權冷淡以對。在如此明顯的脈絡反差下，實有必要重新檢視早前提出的理論框架。

本書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是回顧性的整理，在第一章的導論，Risse & Ropp簡要的勾勒出本書的理論修正方向。在第二章，Jetschke & Liese反省螺旋模式所繫之基本假設是否依然成立，以及不同時空脈絡所帶來的理論衝擊。而在第三章，Beth Simmons從量化分析的角度檢視螺旋模式的解釋效力。本書第二個部分涉及螺旋模式理論修正之細部分析（詳後）；第三部分的章節聚焦於傳統國際關係行為者的行為模式檢視。在第七章，Ann Marie Clark檢視人權條約批准與聯合國監督機制的關係，而第八、第九、與第十章則分別檢視美國、中國、與阿拉伯世界在2000至2010年間的人權政治發展。本書最後一個部分觸及過往較少被關注非國家行為者，討論如在地網路與企業（第十一章）、公司企業（第十二章）、交戰團體（第十三章）所面臨的人權挑戰以及人權規範對彼等的制約效果。

在PoHR中，Risse等人由建構論的角度出發，提出螺旋模式來解釋國際人權規範之社會化（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過程。當國家的社會化傾向，面臨到來自國內外的理念倡導與壓力時，國家行為者會修正其壓迫性的政策作為，並接納人權規範所認可的行為標準。這一變化的過程可以區分成五個階段：從最初的人權侵害引發國際關切，相關政權對於批評所立基的人權價值嗤之以鼻，到壓迫當局策略性的接納人權主張以謀降低壓力，此策略性讓步引發不可逆的效果，使得人權價值在當事國確立

規範性地位，並朝向最終的內國法化以及政策落實方向邁進¹。從這個社會化概念出發，PoHR的作者群檢視了11個國家在人權保障上的發展歷程，以分析其所提出的四個社會化假設是否成立²。從理論假設來看，PoHR的作者把焦點放在非政府的跨國倡議網路（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強調其在國際人權運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以及在規範社會化過程中的影響力。

表1 螺旋模式的五個階段

	階段	重要發展	
一	迫害 (repression)	跨國倡議網路蒐集人權侵害訊息	
二	否認 (denial)	當事國政府否認普世人權原則	
三	策略性妥協 (tactical concessions)	當事國政府口頭肯認人權原則 (妝點門面)	承諾
四	規範性地位 (prescriptive status)	批准人權條約 人權規範內國法化	↓
五	合乎規範行為 (rule-consistent behavior)	人權保障紀錄改善	遵從

資料來源：整理自Thomas Risse & Kathryn Sikkink, *The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into Domestic Practices: Introduction, in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1*, 20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1999).

- 關於螺旋模式內容的詳細介紹，可參考辛翠玲，從中國人權問題看國際人權團體的影響力——論非政府組織及其連結作用，*政治科學論叢*，19期，頁181-202（2003年）。
- 這四個假設主要用以檢視在何種狀況下，人權規範社會化歷程得以進入下一個階段。See Thomas Risse & Kathryn Sikkink, *The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into Domestic Practices: Introduction, in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1*, 22-33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1999).

貳、問題意識：遵從落差

螺旋模式一個主要的問題在於無法解釋由承諾到遵從的不一致現象，近年來有關國際人權體制遵從落差（compliance gap）的現象已經引發許多文獻討論³。學者發現國際人權條約並無法改善人權實況，每個政府都信誓旦旦聲稱認同普世人權價值，也都簽署／批准主要人權公約，但是人權保障的情況卻始終難以讓人滿意。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背離現象？若依照螺旋模式的理路，隨著普世人權規範的擴張，各國受此社會化過程影響，自會將保護人權內化成為行為模式，則權利遭侵害頻率將顯著降低，人權狀況得到改善。可是在2000年以後，我們可以發現國際人權運動不但沒有輕舟已過萬重山，反而艱險益增。

戴欣媛（Dai Xinyuan）認為遵從落差現象在概念與研究方法上都有值得深究之處。首先，她以為遵從落差或許並非真的是如此聳人聽聞的現象，而是國際人權運動常態性面對的狀態⁴。從數據來看，現今主要的人權量化數據資料庫（包括Political Terror Scale以及CIRI Human Rights Project）皆聚焦於人身自由權（personal integrity rights）這個範疇，對於經濟社會權或集體性權利（collective rights）缺乏可參照的紀錄；這些資料庫涵蓋時間大約自1980年代初期開始，然卅餘年來政策界與學界對於人權侵害的認知

3 See Hathaway Oona, *Do Human Rights Treaties Make a Difference?*, 111 YALE L.J. 1935, 1935-2042 (2002); Emilie M. Hafner-Burton & Kiyoteru Tsutsui, *Human Right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The Paradox of Empty Promises*, 110 AM. J. SOC. 1373, 1373-1411 (2005); BETH SIMMONS, *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 (2009); 顏永銘，國際人權法與國內政治動員——評論Beth Simmons的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中研院法學期刊，10期，頁281-300（2012年）。

4 Xinyuan Dai, *The “Compliance Gap” and the Efficacy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85, 99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與理解已有重大變化，並從而影響到編碼（coding）的一致性⁵。此外，既有的文獻在操作化時往往把實際人權保障紀錄（遵從）以平均值方式呈現，然而由於條約簽署／批准後罕有退出的情況，在數據上所呈現出的乃一持續上升的趨勢。以《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例，自1966年聯合國大會採納迄今近五十年來，締約國數量由0上升至168國；然而公民政治權利的保障在同期間的發展則起伏跌宕。對比這兩個性質殊異的指標，自然會產生遵從表現惡化或是遠低於承諾的結論。戴欣媛認為遵從落差現象一定程度上被誇大，人權政治的動態描繪應更加審慎，並探究人權體制如何間接的影響國家行為。她同意Beth Simmons的觀點，認為變動的重心在於國內層面⁶。與其他議題領域的國際制度相較，人權體制本質上弱勢，難以直接對締約國產生影響，須透過間接渠道來發揮作用，以強化國內倡議團體網路的方式來促進政策變遷⁷。

無論是否誇大，遵從落差的確是螺旋模式難以處理的經驗現象，此一問題意識，讓PPoHR的作者們把分析焦點放到整個社會化過程的後半段，也就是此書副標所稱，「由承諾到遵從」（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的過程（表1）。所謂承諾，指行為者接受國際人權作為有效且具拘束力的規範（actors accep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s valid and binding for themselves）；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承諾往往透過簽署／批准國際人權條約加以體現，在螺旋模式中，承諾位於第三個階段策略性讓步的後期到第四個階段，但PoHR中並沒有很清楚的界定。另一方面，遵從則意指符合國際人權規範的持續性行為與國內實踐（sustained behavior and domestic practices that conform to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這個部分

5 See *id.* at 90-92.

6 See SIMMONS, *supra* note 3, at 126.

7 戴欣媛在此特別指出兩種間接機制的運作。首先，人權體制可提升民間社群的政治影響力（political leverage），並增益其訊息資源。再者，人權體制對於國家政策的影響力大小取決於民間社群之強弱。See Dai, *supra* note 4, at 97.

主要涉及條約批准後的執行落實，諸如公約內國法化，修正行政作為，以及司法體系適用等⁸。以螺旋模式來看，遵守等同於第五階段的合乎規範行為（rule-consistent behavior）。

Risse & Ropp承認，在PoHR中對於由承諾到遵從階段的理論建構並不完整⁹。PoHR預設：誘發螺旋模式前半段的行動機制（mechanism of social action）對於後續的過程有類似的驅動效果，雖然「螺旋」兩字意謂非線性因果關係，但在適用時卻常為研究者忽略，形成「頭過身就過」的印象。也就是說，當人權規範社會化過程展開後，特別當跨越了特定臨界點時，其後續發展將不可逆轉¹⁰。

參、螺旋模式2.0

基於上述的經驗異例以及理論缺失，PPoHR對螺旋模式進行修正，首先是更細緻的分析不同的規範社會化機制（參見圖1）。從建構論的觀點出發，Risse & Ropp指出¹¹，行為者的成本效益分析往往鑲嵌在一個更全面性的適切性邏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中，這些受規範引導的行為透過國際人權體制加以制度化。在人權理念優勢已然明確，人權法制逐漸成形的情境下，分析的重心應置於影響後續人權政策作為的社會機制，以及這些機制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PPoHR列出的四項社會機制包括強制（coercion）、誘因

8 Thomas Risse & Stephen C. Ropp,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3, 9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9 *See id.* at 11.

10 Finnemore & Sikkink 所談到的「規範擴散」(norm cascade)，也反映了類似的意涵。*See* Martha Finnemore &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52(4) INT'L ORG. 887, 902 (1998).

11 *See* Risse & Ropp, *supra* note 8, at 13.

(incentives)、說服／論述(persuasion & discourse)以及能力建立(capacity building)¹²。在PoHR中，對於物質性誘因與理念性論述兩機制已有所討論，但對於相關行為者的能力建立卻少有著墨，這導致螺旋模式面對非志願性的不遵從現象(involuntary non-compliance)難以有效解釋¹³。受到建構論典範的影響，PoHR認為人權變遷的關鍵乃當事者的意願，而非能力問題。至於當事者是否足以承擔起相應的人權義務？以及如何提升其執行人權規範能力？則未能得到充分關注。相較之下，PPoHR承認先前分析架構的盲點，承認在某些案例中人權規範發展不盡如人意，「非不為也，乃不能也。」

在不同機制間的關係上，Ryan Goodman & Derek Jinks在第六章提出了新的看法。人權規範社會化過程中，不同性質機制的效果並非單純加乘，而是可能會相互抵銷或出現排擠效應¹⁴。社會化涉及行為者內在信念的轉化，Goodman & Jinks從心理學與動機理論出發，發現同時採取物質性與非物質性途徑不會產生累加的效果，反可能形成「過度辯護」(overjustification)現象¹⁵。物質性誘因所傳達的訊息往往抵銷了內化機制的影響，認知上的改變在援助或制裁等硬手段下模糊難辨，連當事者本身也迷失其中，混淆手段與目的。如此一來，短期內或可看到顯著的行為變化；但長期來看，遵

12 See *id.* at 13-16.

13 在PoHR中，Risse & Sikkink區分了三種社會化過程：策略性的議價(strategic bargaining)，論述與遊說(argumentation and persuasion)，以及最後的制度化及習慣化(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habitualization)。See Risse & Sikkink, *supra* note 2, at 11-12.

14 Ryan Goodman & Derek Jinks, *Social Mechanism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plementary or Contradictory?*,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103, 105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15 又稱作德西效應(Deci Effect)，由心理學家Edward Deci透過實驗發現。See Edward Deci, *The Effects of Externally Mediated Rewards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18(1) *J. PERSONALITY & SOC. PSYCHOL.* 105 (1971).

從行為與人權價值建立連結的機會卻喪失了。不僅如此，未能得到有效執行的物質性機制也會對於社會性機制產生不利的影響。鑒於不同機制間的排擠效應與衝突可能，Goodman & Jinks認為可藉由操作上時序（sequencing）的調整來降低負面效果的發生，不過這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公式可以參照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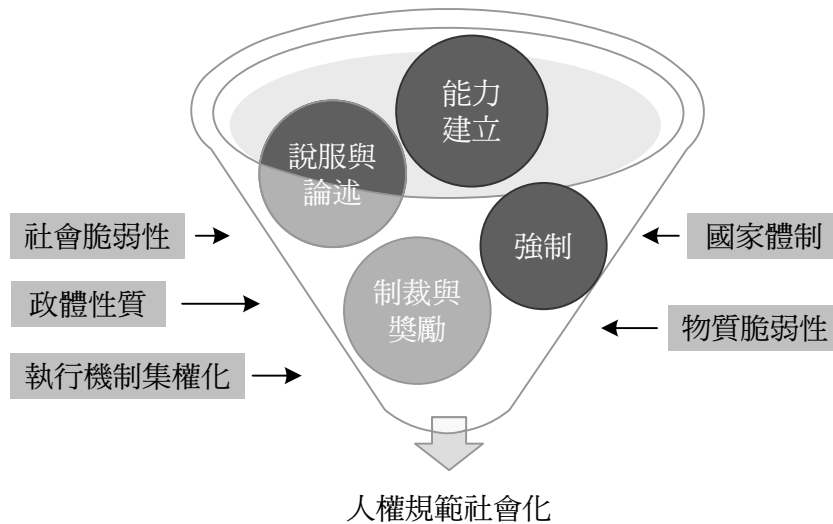


圖1 螺旋模式2.0

資料來源：Thomas Risse & Kathryn Sikkink,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3*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Risse & Ropp認為PPoHR另外一項重要理論進展，在於整理出五組影響遵從行為的限制性條件（scope conditions）：政體性質，鞏固 vs. 缺陷國家體制（statehood），規則執行集權化與否

¹⁶ See Goodman & Jinks, *supra* note 14, at 116-17.

(centralized vs. decentralized rule implementation)，物質面脆弱性，以及社會面脆弱性¹⁷。這些條件影響了上述社會化機制的適用範疇。政體性質的人權效果長久以來便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學界一般同意，民主體制與威權政體在人權規範社會化過程中反應殊異，民主體制內在的制衡機制，會使政府有較強動機遵守已承諾的人權條約義務¹⁸。

國家體制與執行面集權程度都涉及到螺旋模式原初預設的修正。在PoHR中，作者們視有效統治的政府為常態，忽略了缺乏有效統治能力國家所面臨的困難，「失敗國家」乃最明顯的例子。當然，制度能力缺陷可能非普遍性的現象，而有地域性分布或受影響群體的差異，例如邊疆地區對於人權規範的落實可能就面臨資源不足的挑戰。另一方面，受到國際關係基本預設影響，螺旋模式將國家視為單一行為者，由承諾到改革的發展端視中央政府的意志。然而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單純，決策集中程度對於遵從行為有相當影響，而承諾與執行是否為相同行為者也會對於遵從的表現有所衝擊，地方政府可能不願意承擔中央政府對外宣示的政策目標。在高度分散的執行體系下，能力建立將是促進遵從表現的重要因素。在第四章中，Tanja A. Börzel & Thomas Risse比較了瓜地馬拉與喬治亞兩國的人權社會化歷程，這兩國內部主要的人權侵害者皆非直接與統治當局相關，中央政府雖有意願，但能力不足以確保其承諾義務之有效落實。就整體的人權保障的進展來看，瓜地馬拉在2000年後明顯出現停滯甚至惡化的趨勢，而喬治亞則有一定的改善。Börzel

17 See Risse & Ropp, *supra* note 8, at 16.

18 See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George W. Downs & Alastair Smith, *Thinking Inside the Box: A Closer Look at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49 INT'L STUD. Q. 439 (2005); Christian Davenport, *State Repression and Political Order*, 10 ANN. REV. POL. SCI. 1 (2007); Andrew Moravcsik, *The Origins of Human Rights Regimes: Democratic Delegation in Postwar Europe*, 54 INT'L ORG. 217 (2000); 顏永銘，民主必然促進人權？——東南亞人權保障的實證分析1981-2008，政治科學論叢，56期，頁91-118（2013年）。

& Risse認為造成兩國差異性表現的主要因素在於後者得到西方社會較多的協助，使其中央政府得以強化執行能力¹⁹。

最後兩組變數是人權研究文獻已有所著墨的標的脆弱性²⁰。擁有物質資源越多的行為者其抗拒變遷的能力愈強，此一「現實主義」色彩的論點不證自明。然而脆弱程度與變動的關係並非線性，而端視此變數對上述四種機制的影響而定。另一方面，社會脆弱性指涉的是形象問題，當事者企圖成為特定社群的一份子，因而對於該社群在理念上的認可異常敏感。對國家而言，社會脆弱性指涉其國際正當性；而對非國家行為者來說，社會脆弱性有時與物質脆弱性密切相關。例如跨國公司出於對本身品牌形象的重視，而採取符合人權規範的採購作業程序，以免衝擊其營收利潤。在第十二章中，Nicole Deitelhoff & Klaus Dieter Wolf甚至指出部分企業在社會化過程中，從規範消費者變成規範倡議者（norm entrepreneurs）的角色轉換。如耐吉（Nike）公司面對反血汗工廠運動時，從一開始堅稱自己是「運動產業」而非製造業，展現出典型的拒絕態度，到後來積極推動整個產業的轉型，不僅透過其本身的生產體系，甚至遊說競爭對手共同提升整個產業的勞動條件²¹。

在第十三章中，Hyeran Jo & Katherine Bryant分析內戰期間反抗團體對國際人權規範的應對模式，他們發現雖然國內政治秩序受到極大衝擊，但反抗團體絕非全然目無法紀的狂熱破壞者。隨著內戰的開展，部分武裝團體會基於理性考量而調整其對於國際人權規

19 Tanja A. Börzel & Thomas Risse, *Human Rights in Areas of Limited Statehood*,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63, 81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20 See MARGARET KECK &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8).

21 See Nicole Deitelhoff & Klaus Dieter Wolf,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How Corporate Norm Violators Become Norm Entrepreneurs*,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222, 231-34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範的態度，甚至修正其作為。他們以1991-2006年期間國際紅十字會（ICRC）的人道探視做為觀察指標，檢視可能影響探視請求同意／拒絕的變數。量化分析的結果顯示，集權化程度以及脆弱性程度較高的反抗團體，較可能接受國際紅十字會的人道探視²²。

五項限制性條件之間是否存在著關聯性？Risse & Sikkink由意願（willingness）與能力（capability）兩個面向將限制性條件進行分類，其中政體類型與脆弱性影響目標行為者（target）的意願，而國家體制與執行機制集權化程度則與目標行為者的能力有密切關係。由這兩個軸線所建立的變化類型，可讓研究者透過觀察各項限制性條件的情況，推估相關行為者在特定個案中出現人權演進的機率高低²³。以非洲地區推動終結女性割禮（FGM）為例，目標行為者多屬於非民主體制，割禮的物質與社會脆弱性均不甚顯著；而在與能力相關的變數上，終結割禮案例也都落在最不利的位置，所以其進入螺旋模式最後階段的可能性難以令人樂觀看待。

肆、評價PPoHR

PPoHR在300頁內文的篇幅中，企圖涵蓋螺旋模式研究成果的評估，理論的修正強化，以及個案分析驗證等目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務，且因為是多人合著作品，使得情況更為複雜。在PoHR中，編者與作者維持了相當程度的論證一致性，個案分析的討論皆由螺旋模式提供的框架出發，作者也都有意識地讓經驗事實與理論

22 See Hyeran Jo & Katherine Bryant, *Taming of the Warlords: Commitment and Compliance by Armed Opposition Groups in Civil Wars*,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239, 247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23 See Thomas Risse & Kathryn Sikkink, *Conclusions*,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275, 286-87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進行對話。相較之下，PPoHR在結構上較為鬆散，這是因為部分作者聚焦於理論框架的反省與文獻評估所致，不過在經驗分析的部分，仍可見到作者企圖連結螺旋模式2.0與個案的努力。

整體來說，本書在理論上的反省與修正成果最為顯著，對於螺旋模式的機制，以及能否產生預期變化的限制性條件都有進一步的增補與討論。而在經驗證據上，由於新修正的理論涉及多重的變數與行為者，導致雖有八個章節涉及經驗分析，但其所提供的支持仍難稱完整²⁴。以下針對經驗分析，方法論，以及理論的進步性分別加以說明。

作為重新檢視螺旋模式的後續作品，理應對PoHR所涵蓋的各國案例進行全面性的回顧，評斷十餘年後相關國家的人權狀況是否仍符合模式的預測，並與修正的理論進行核對²⁵。但PPoHR涉及經驗討論的章節中，僅有Vera van Hüllen 對摩洛哥與突尼西亞兩國的討論，與PoHR中Sieglinde Gränzer的分析前後呼應²⁶。在PoHR最後一章，Risse & Ropp 整理了各國的情況，發現有四個國家（摩洛哥、印尼、突尼西亞、肯亞）並未全然符合螺旋模式的擴散現象，仍停留在第三階段；另外7國則進入了規範性地位／合乎規範行為階段²⁷。依照螺旋模式，進入第四階段後人權規範於目標國已取得

24 PPoHR中以國家為研究客體的分析多聚焦於限制性條件的辨析，而第四部分各章則探討非國家行為者面對社會化壓力的回應。

25 類似的作法如1989年出版的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便針對1963年所出版的《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書中所探討的五個國家（英國、德國、墨西哥、美國、義大利）分別以專章再次討論。See GABRIEL A. ALMOND &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1989).

26 See Vera van Hüllen,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Spiral Model: Tunisia and Morocco*,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182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27 See Thomas Risse & Stephen C. Ropp,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Conclusions*, in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234, 259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1999).

正當性地位，實際的人權保障情況當穩步提升或維持在相當水準。根據CIRI人權資料庫(CIRI Human Rights Data Project)，表2對於PoHR所分析的11個國家在世紀之交與2010年前後的人權情況進行比較。十年過後，7個被視為成功將人權規範社會化的國家中，菲律賓、南非、與烏干達三國人身自由權明顯呈現衰退，若再加上其餘四國，則當初PoHR所檢視的11國，在十餘年後真正達到穩定的人權保障(5分以上)者僅有智利、捷克、瓜地馬拉、與波蘭。本文限於篇幅，無法在此進行更為深入的跨國比較分析，但是這樣的經驗事實，不僅證成了PPoHR編者所提出的遵從落差問題意識，更顯示出PPoHR未能追蹤相關國家後續發展的不足。遵從落差大抵著眼於那些未能有效社會化的案例，然而對於已經進入階段四／五的個案為何出現頓挫，本書並未直接處理這些經驗上不一致的個案。

表2 PoHR討論個案國家10年後

國家	PoHR的判斷 (規範擴散 是否成功)	1999年 人權保障情況	2010年 人權保障情況	符合 理論預期
智利	成功 (階段四／五)	3.33	5.67	是
捷克	成功 (階段四／五)	7.33	7.67	是
瓜地馬拉	成功 (階段四／五)	3.67	5.67	是
印尼	未成功 (階段三)	0.33	3	
肯亞	未成功 (階段三)	1.67	3.33	
摩洛哥	未成功 (階段三)	4.67	4	緩慢邁向 compliance
菲律賓	成功 (階段四／五)	1.67	1	否

波蘭	成功 (階段四／五)	7.67	6.33	是
南非	成功 (階段四／五)	4	2.67	否
突尼西亞	未成功 (階段三)	4.33	3	
烏干達	成功 (階段四／五)	3.33	2	否

* 人權保障指標採用CIRI人權資料庫數據，分數由0分（最低）至8分（最高）。數值越高表示人身自由權保障情況越佳，為避免單一年度因特定事件造成數值波動過大，採前後三年平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CIRI Human Rights Data Project。網址：<http://www.humanrightsdata.com/>（最後瀏覽日：2016年7月18日）。

雖然PPoHR在經驗分析的部分有所不足，但由相關章節的呈現則可見到人權研究領域近年來在方法論上的進展。PoHR的各章透過單一國家個案研究或跨國比較分析來驗證螺旋模式的主張。此種依賴質化分析的研究設計在方法論上可能面臨選擇性偏誤（selection bias）的質疑，形成理論具有強大解釋力的錯覺，並讓PoHR的編者得出樂觀的推論。然而1990年代後人權研究量化分析的興起，提供了另一個觀察的角度。相較於質化分析的樂觀圖像，量化研究往往呈現出悲觀的色彩，不認為人權規範或推動規範的倡議網路真能有效影響當事國行為。PPoHR核心問題意識（遵從落差）相當程度上便是從量化研究文獻中得到啟發²⁸。不同的研究途徑各有所長，無絕對優劣之分，但隨著人權議題在學術與政策場域的擴張鞏固，量化分析的價值的確不容忽視。在PPoHR中，Jo & Bryant對於內戰中反抗團體行為模式的分析，以及Ann Marie Clark對於人權條約批准與聯合國監督機制的影響，皆採用量化方式進行跨國檢證²⁹。相較於質化途徑，跨國分析有助於釐清不同變數之間

²⁸ See Risse & Ropp, *supra* note 8, at 10.

²⁹ See Ann Marie Clark, *The Normative Context of Human Rights Criticism: Treaty*

的互動脈絡，特別在此書將螺旋模式運作高度複雜化之情況下³⁰。

理論的調整與修正乃科學知識發展的常態，然而我們應當如何評價理論的進步與否？換言之，螺旋模式2.0是否為成功的理論修正？在此或可借用科學哲學家Imre Lakatos 所發展出的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來進行評估³¹。簡單來說，科學知識的進步，並非全然如同孔恩（Thomas Kuhn）所主張的典範轉移式革命，而是一系列理論構成的綱領在面對經驗異例時進行的調整，研究綱領透過更換外層輔助性假設以增加解釋力，並同時保護理論內核心不受挑戰³²。若新修正的綱領可以回應先前無法處理的異例，並進一步解釋新的現象，則可以被視為成功的理論進展。由PoHR到PPoHR，可看出五項限制性條件為新的外層輔助性假設，另一方面，社會機制的部分則不可避免的碰觸到研究綱領的內核。宏觀來說，螺旋模式屬於建構論的研究綱領，其最重要的核心假設即肯認非物質性因素在國際關係研究的獨立地位，規範與認同可以賦予物質力量實質意義。然而當作者在討論四種機制時，卻讓物質主義的假設影響了螺旋模式的主要軸線——人權規範社會化。制裁與獎勵，以及強制機制涉及了不同的社會行動邏輯，而並非與建構論

Ratification and UN Mechanisms,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125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30 量化分析最大的限制在於資料可取得性，人權研究自1980年代起已有相關資料庫建立的努力，但所涵蓋的範圍仍有限制，且多以國家作為觀察對象，是以當非國家行為者成為分析客體時，困難極大。如Jo & Bryant有關人道探視的數據便有高達78%的缺失資料（missing data），由這樣的資料所進行的推論，其價值顯需審慎看待。See Jo & Bryant, *supra* note 22, at 244.

31 See IMRE LAKATOS,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8-49 (1978).

32 See Colin Elman & Miriam Fendius Elman, *Introduction: Appraising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19 (Colin Elman &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3). 有關國際關係理論與科學進步的關係，可參見廖舜右，Thomas Kuhn與Imre Lakatos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政治科學論叢，29期，頁31-48（2006年）。See Clark, *supra* note 29, at 125.

所賴的適切性邏輯一致。螺旋模式2.0固然解釋了部分的經驗異例，但能否回應有關社會化的新事實則有待商榷。從這個角度來看，螺旋模式2.0僅能視為臨時性（ad hoc）的修正，其開創性值得深思。

伍、重新思考人權規範社會化

嚴格來說，螺旋模式2.0並非全然創新的概念。無論是四大影響機制或是限制性條件，在過去十餘年的文獻中，甚至PoHR內都已有所觸及。建構論外的國際關係理論多傾向透過誘因機制來分析人權政治的動態發展，著眼於人權作為國際互動的交易籌碼。表3列出幾本重要文獻對於影響規範擴散的討論，可以發現其所列出的變因之間有相當的重疊性。PoHR歸納出三項變數：窒礙性因素（blocking factors），社會開放性程度，與世界時間³³。窒礙性因素涉及威脅國家統治權力穩定或領土完整的分歧（如族群衝突），也就是國家體制以及執行機制集權化的議題，而社會開放性則顯然與社會脆弱性密切相關。Keck & Sikkink 從行為者與議題兩個面向切入，探討跨國倡議網路（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如何發揮影響力³⁴。其中對於目標國脆弱性的討論，顯然與政體性質，國家體制，與物質脆弱性相關。而在執行機制的議題上，Beth Simmons也已有所討論³⁵。由此來看，PPoHR在理論上的貢獻，主要在於整理過去十餘年間人權研究文獻，並由螺旋模式中自我解放，超越當初理論建構時參照的環境脈絡，修正其隱含的樂觀期待。

33 Risse & Ropp, *supra* note 27, at 260-67.

34 See KECK & SIKKINK, *supra* note 20, at 25-28.

35 See SIMMONS, *supra* note 3, at 125-35.

表3 影響規範擴散的因素

作品	影響規範擴散的變因	作者
<i>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	Actor characteristics (行為者) Target vulnerability (行為者) Issue characteristics (議題)	Keck & Sikkink (1998)
<i>PoHR (Spiral model)</i>	Blocking factors Degree of societal openness World time (norm / regime strength)	Risse, Ropp & Sikkink (1999)
<i>PPoHR (Spiral model 2.0)</i>	1. 政體性質 (Democratic vs. Authoritarian regimes) 2. 國家體制鞏固程度 (Consolidated vs. limited statehood) 3. 規則執行之集權化程度 (Centralized vs. decentralized rule implementation) 4. 物質脆弱性 (Material vulnerability) 5. 社會脆弱性 (Social vulnerability)	Risse, Ropp & Sikkink (2013)
<i>Socializing States: Promoting Human Rights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i>	1. Targeting capacity and target actor characteristics 2. Influence agent characteristics	Goodman & Jinks (201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螺旋模式源自於建構論的脈絡，透過新變數與機制的引入，螺旋模式2.0對於非志願性不遵從現象提供了一定的解釋。但這是否代表了遵從落差的全貌？對於已經做出承諾，也具備能力，但就是拒絕落實人權規範的行為者來說，PPoHR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Sikkink在書中對於美國的個案分析很明顯的呈現了這樣的困境，美國在反恐戰爭期間對於違反其在《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下的條約義務明顯不符螺旋模式的預期，Sikkink試圖以美國在物質與社會層面皆無脆弱性來說

明，但這樣的說法無法回應布希政府企圖解構反酷刑規範，並反轉社會化進程的作法。類似的遵從落差行為絕非罕見，很多開發中世界國家都可以發現政府對於普世人權規範做出承諾，簽署批准公約，但實際的人權表現依然故我。Sikkink最後談到，懲罰，司法追訴，或執法都是重要手段，但仍需佐以規範的內化（*internalization*）方能達成遵從人權的目標³⁶。這又把問題拉回原點。

無論是螺旋模式，或是與其關係密切的跨國倡議網路，都明顯帶有工具性理論的特質³⁷。理論的增補必然面臨喪失簡潔操作性的風險，表面上涵蓋了更大的適用空間，但犧牲了清楚的因果連結。PoHR的核心論點強調跨國能動者網路推動人權規範的擴散，影響國家人權實踐。但在PPoHR的經驗分析中，此一因果軸線非常模糊，而多是討論在不同限制性條件下，規範社會化進程之可能性增減。以研究設計的角度來看，限制性條件概念上如同調節變數（*moderator*），其存在影響了自變數（規範倡議活動）與應變數（人權變遷／社會化）之間關聯的強度。如上所言，這樣的修正是否足以處理新的經驗異例，則是一大問題。在PPoHR各章分析中看到很多新行為者成為分析焦點，但編者似預期螺旋模式本身仍可適用於這些新的人權政治現象。而不同社會機制的討論，是否意味著螺旋模式無法完整處理規範擴散？由本書書名來看，編者顯然不這麼認為。筆者以為，螺旋模式2.0比較類似一具指引性的分析架構，涵蓋可能的變數列表，而在其中規範能動者所扮演的角色，與PoHR相比顯然有別。此外，四大機制與五大限制性條件的架構是否適切也值得省思，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由一過程或週期的角度來分析人權規範社會化，在這樣的概念下，筆者以為Keck & Sikkink所提出

36 See Kathryn Sikki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rture: Does the Spiral Model Work?*,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145, 162-63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37 辛翠玲，*跨國公民政治研究與理論發展之反思，問題與研究*，51卷3期，頁12（2012年）。

的框架（見表3）更能完整的考慮到影響變遷的不同行為者與議題。由下面的討論可以了解，倡議網路的行為者，議題本身的內涵與特質，以及目標行為者都會衝擊整個社會化的進程。

從一個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從建構論提出國際規範概念開始，學界就開始思考影響規範散佈（norm diffusion）的因素³⁸。筆者以為，螺旋模式2.0的主要侷限在於未能正視人權規範社會化的概念型構，當演變的過程進入後期階段，牽涉的行為者，議題性質，與互動的層次都與規範過程的前期有極大差異。就行為者而言，制度化涵蓋的立法過程，與成法後在國際與國內層次衍生的後續發展（國際監督與國內司法訴訟），都會帶入新的行為者。司法部門基於職責而參與，但其意願與能力乃變數而非常數，限制性條件中有關集權化之討論主要集中於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不一致，而忽略部門之間（行政與司法）對於人權法規可能出現的不同態度。此外，當社會化過程進入後期階段時，原先在跨國倡議網路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國際行為者介入的空間將大幅壓縮，國內司法程序的外部化並非良好策略，國外協力者甚至必須自我迴避以免遭到文化霸權的批判。

從議題面來看，規範社會化的文獻多建立在新行為者學習並內化既存國際規範的預設上。然而社會化並非全然是單向的發展，而存在雙向互動的可能，此外規範的理念內涵也並非全然不變，而會隨所處脈絡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甚至出現圍繞著規範本身進行的概念論戰。遺憾的是，這些面向在螺旋模式2.0中並沒有得到足夠的考慮。在PPoHR的經驗分析中，可以看到研究者已經關注到不同行為者的問題，然對於議題／規範本身所蘊含的變動性則關注有限。

38 See Finnemore & Sikkink, *supra* note 10, at 887-917.

那麼，是否有其他不同的理論能彌補螺旋模式2.0在社會化機制討論的不足？Goodman & Jinks在2013年所出版的SOCIALIZING STATES: PROMOTING HUMAN RIGHTS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呈現了他們對於規範擴散機制的反省。相較於PPoHR，Goodman & Jinks認為社會影響的機制主要有三，物質性的誘導，說服，以及同化（acculturation）。所謂同化是指行為者採納周遭環境文化的信念與行為模式，其之所以如此係出於認同參照團體所產生的認知與社會壓力³⁹。同化與說服（persuasion）在概念上有高度相關，但卻並不相同。說服機制運作的核心在所指涉之規範內容，而同化所關切乃規範背後的社會關係網路，某種程度上，同化是一不完整的內化狀態。Goodman & Jinks認為，人權議題在全球政治的發展比較符合同化的過程，而不是趨向價值內化的社會化進程，更非物質誘因所造成的結果。此同化現象固然會出現簽署國際人權條約等進展，但這種制度上趨同（isomorphism）並不意味著締約國真心誠意的接受相關的規範內容，因為在經驗上往往可以觀察到當事國的「脫鉤」（decoupling）行為，也就是在組織結構與正式政策上與國內實質的需求分離狀態⁴⁰。遵從落差所反應的正是同化機制的運作實況，能否進一步推進內化程度，須考量其他變數，Goodman & Jinks認為這包括目標國的特質，影響者的特質等（見表3）⁴¹。

Goodman & Jinks的同化理論與螺旋模式2.0形成有趣的對比，後者關注條件性變數，而前者聚焦在規範擴散的內在機制上。受到世界政體模式（world polity model）的啟發，同化理論不可免的帶有結構決定論的色彩，強調國家之間行為的趨同乃受到全球文化結

39 See RYAN GOODMAN & DEREK JINKS, SOCIALIZING STATES: PROMOTING HUMAN RIGHTS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4 (2013).

40 See *id.* at 43-46.

41 See *id.* at 183-84. 國內對於涵化理論的討論可參考李明勳，亞洲價值與人權規範社會化：從東協人權建制的發展與挑戰分析東南亞的人權政治，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

構的制約⁴²。這樣的觀點實際上也難以處理動態的規範變遷問題，不過同化論對於社會機制的分析確實比螺旋模式更為合理細膩，也呼應了戴欣媛認為遵從落差乃過度誇大的現象。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面向是議題／規範本身的問題。螺旋模式或世界政體大體上認為非政府行為者乃規範內容主要的創作者，他們決定了議題的內容，設定了規範運作的腳本（script）。但近年來逐漸有學者指出，議題本身往往才是規範擴散出現差異的關鍵，姑且不論那些企圖挑戰規範內容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t）國家，倡議網路的行為者對於議題的價值，方針，與策略都可能產生不同意見，甚至彼此競爭。換言之，規範（norm）在社會化過程中不應被當成不變的客體，而是該把規範本身視為過程的一部分（norm as processes）⁴³。與此概念類似的，則是從雙向的角度來理解規範社會化，特別是崛起的新興強權對於國際規範的挑戰與修正，這樣一來，規範擴散的問題意識不再只是理念是否（whether）重要，理念如何（how）發揮影響力，更涉及到誰的理念（whose idea）發揮作用的問題⁴⁴。當然社會化的雙向過程並非必然，端視規範議題的內容而有不同的可能，而其結果多非根本性的替代，而可能是對既有規範的調整。即便如此，螺旋模式討論的標的國／行為者確實可能不再只是規範接受者（norm-taker），而也有成為塑造者（norm-maker）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規範本身以及社會化過程的反省，在PPoHR中部分章節可見端倪。Jetschke & Liese對於普世人權價值的

42 See John W. Meyer et al.,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103(1) AM. J. SOC. 144 (1997).

43 Mona Lena Krook & Jacqui True, *Rethinking the Life Cycles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Global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18 EUR. J. INT'L REL. 103, 108-09 (2012).

44 See Pu Xiaoyu, *Socialization as a Two-way Process: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5(4) CHINESE J. INT'L POL. 341, 346-48 (2012).

規範性爭論（*normative contestation*）進行反省。現代意義的人權運動一直在理念上與國家主權原則進行典範競逐，由主權此一核心開展出的原則（如領土完整與合法壟斷暴力）與人權典範下的各原則針鋒相對，妨礙人權規範的推進與落實⁴⁵。主權與人權兩大典範的競爭，在不同時空脈絡下互有消長。PoHR編者提出「世界時間」（*world time*）的概念，認為人權理念與價值呈現出取代國家主權的大趨勢。然實際情況是否真如此？國際規範框架間的共存與競爭必然會產生適用何者的政治問題，人權規範在道德上的優越地位並不能確保其普遍性，遑論對於人權規範內涵的爭議始終未曾平息。易言之，在規範競逐的世界中，普世人權有不再享有「王牌」（*trump*）地位^{46,47}。

冷戰結束曾被視為是國際人權運動發展的大好良機，但少有人料到文化相對主義在1993年維也納世界人權會議引發的激烈爭辯；而當「亞洲價值論」後來漸失動能之際，經濟改革有成的中國卻成為型塑人權規範的重要角色。Katrin Kinzelbach對於中國的討論不但檢視了規範社會化在中國困境，更透露出新興強權對於國際規範的修正意圖與嘗試⁴⁸。對於中國這樣有能力但缺乏改變意願的行為者來說，螺旋模式啟動的機會之窗並不常見；即便啟動，整個社會

45 See Anja Jetschke & Andrea Liese,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a Decade After: From Euphoria to Contestation?*,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26, 35-38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46 See *id.* at 41.

47 比較遺憾的是，Jetschke & Liese並沒有對於規範競爭的概念進行更深刻的探討，筆者認為他們某種程度上遷就了螺旋模式2.0的架構而去論證限制性條件與規範脈絡的關係，包括在三種情況下，螺旋模式的跨國網路動員效果將受到限制。第一、國家統治權威面臨的武裝威脅；第二、國家領土完整或世俗性質受到威脅；第三、民主政體遭受非合憲方式挑戰。See *id.* at 38-39.

48 Katrin Kinzelbach, *Resisting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164, 164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eds., 2013).

化過程從第一階段開始便充滿挑戰，北京一方面可運用改革開放所積累之物質基礎彌補其國際聲望的失分，另一方面則積極在國內發展對立觀點（counterargument）以抵銷人權規範的影響力。Kinzelbach 認為螺旋模式所提出的社會機制都不足以推動中國人權狀態向遵從階段邁進，這也正是前面所談到的理論困境所繫。是故，Kinzelbach最後悲觀的指出跨國公民社群除了後勤支援外，只能等待中國國內倡議份子開啟機會之窗⁴⁹。

近卅年來，人權研究的發展從人權侵害的起因，制度的建立，到改善人權表現的影響因素，都累積了相當的成果。在這個大圖像中，螺旋模式是一塊重要的拼圖，它強調行為變遷在相當程度上可以透過自發性的理念建構與組織串聯觸發。Hafner-Burton由文獻中歸納出六項主要的防制人權侵害策略，包括軍事干預，貿易投資，援助，經濟制裁，國際法，與訊息策略等⁵⁰。螺旋模式與最後兩者關係密切，但並非全面主宰人權政治的理論解釋。由前面的討論可知，PPoHR的修正遺漏了對於核心因果機制的反省。問題不見得都在於限制性條件，而是規範擴散本身的機制，以及規範本身的演變過程都可能對遵從落差產生衝擊。這些問題都和理論所處的環境脈絡息息相關，換句話說，螺旋模式究竟是一具普遍性的理論？抑或只是在特定時空環境下出現的一波社會政治變遷？此一特定的浪潮受益於第三波民主化，以及冷戰對抗的結束，構成國際論述螺旋（discursive spiral）生成的友善外環境。廿年過後，情況已然大變，倡議者面臨更為複雜的內外結構，人權受害者的身分日趨多元，甚至進入人權體制，成為決定規範內容的論述製造者。論述螺旋由國際進入國內層次，規範內容透過制度化取得不同與過往的法律性質，論述螺旋能否持續？如何持續？這些問題仍然持續困擾著人權

49 See *id.* at 180-81.

50 See Emilie Hafner-Burton, *A Social Science of Human Rights*. 51 J. PEACE RES. 273 (2014).

研究者。或許當互動的焦點從國際與跨國層次回到國內之際，所參照的學門知識也當有所調整，由法學或法律社會學觀點，啟發我們理解由（法）規範到行為之間的細微之處。

參考文獻

1. 中文部分

- 辛翠玲 (2003), 從中國人權問題看國際人權團體的影響力——論非政府組織及其連結作用, 政治科學論叢, 19期, 頁181-202。
- (2012), 跨國公民政治研究與理論發展之反思, 問題與研究, 51卷3期, 頁1-22。
- 李明勳 (2016), 亞洲價值與人權規範社會化: 從東協人權建制的發展與挑戰分析東南亞的人權政治,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舜右 (2006), Thomas Kuhn與Imre Lakatos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 政治科學論叢, 29期, 頁31-48。
- 顏永銘 (2012), 國際人權法與國內政治動員——評論Beth Simmons的 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 中研院法學期刊, 10期, 頁281-300。
- (2013), 民主必然促進人權? ——東南亞人權保障的實證分析1981-2008, 政治科學論叢, 56期, 頁91-118。

2. 外文部分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89.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 Börzel, Tanja A., and Thomas Risse. 2013. Human Rights in Areas of Limited Statehood. Pp. 63-84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George W. Downs, and Alastair Smith. 2005. Thinking inside the Box: A Closer Look at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9:439-457.
- Clark, Ann Marie. 2013. The Normative Context of Human Rights Criticism: Treaty Ratification and UN Mechanisms. Pp. 125-144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i, Xinyuan. 2013. The “Compliance Gap” and the Efficacy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Pp. 85-102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enport, Christian. 2007. State Repression and Political Order.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0:1-23.
- Deci, Edward. 1971. The Effects of Externally Mediated Rewards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8(1):105-115.
- Deitelhoff, Nicole, and Klaus Dieter Wolf. 2013.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How Corporate Norm Violators Become Norm Entrepreneurs. Pp. 222-238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2003. Introduction: Appraising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20 in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innemore, Martha, and Kathryn Sikkink. 1998. International Norm

-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887-917.
- Goodman, Ryan, and Derek Jinks. 2013. Social Mechanism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plementary or Contradictory?. Pp. 103-122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13. *Socializing States: Promoting Human Rights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fner-Burton, Emilie. 2014. A Social Science of Human Righ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1:273-286.
- Hafner-Burton, Emilie, and Kiyoteru Tsutsui. 2005. Human Right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The Paradox of Empty Promis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1373-1411.
- Hüllen, Vera van. 2013.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Spiral Model: Tunisia and Morocco. Pp. 182-200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tschke, Anja, and Andrea Liese. 2013.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a Decade After: From Euphoria to Contestation?. Pp. 26-42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 Hyeran, and Katherine Bryant. 2013. Taming of the Warlords: Commitment and Compliance by Armed Opposition Groups in Civil Wars. Pp. 239-258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ck, Margaret, and Kathryn Sikkin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inzelbach, Katrin. 2013. Resisting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p. 164-181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ook, Mona Lena, and Jacqui True. 2012. Rethinking the Life Cycles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Global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103-127.
- Lakatos, Imre.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John W.,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1997.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144-181.
- Moravcsik, Andrew. 2000. The Origins of Human Rights Regimes: Democratic Delegation in Postwar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217-252.
- Oona, Hathaway A. 2002. Do Human Rights Treaties Make a Difference?. *Yale Law Journal* 111:1935-2042.
- Pu, Xiaoyu. 2012. Socialization as a Two-way Process: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4):341-367.
- Risse, Thomas, and Kathryn Sikkink. 1999. The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into Domestic Practices:

Introduction. Pp. 1-38 in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3. Conclusions. Pp. 275-295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sse, Thomas, and Stephen C. Ropp. 1999.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Conclusions. Pp. 234-278 in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3.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Pp. 3-25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kkink, Kathryn. 2013.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rture: Does the Spiral Model Work?. Pp.145-163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From Commitment to Compliance*, edited by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mmons, Beth. 2009. *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view

Is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Still Influential?:

A Reflection on the Spiral Model and Norm Socialization

*Yung-Ming Yen**

Abstract

In 1999, the publication of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spired a huge body of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norm and human rights. After over a decade,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has come out as the sequel in a remarkably different contex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 themes in the sequel and assess the theoretical modification. The revised spiral model satisfies some empirical anomalies that have emerged since 2000.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human rights change driven by ideational transformation/socialization is largely compromised by the shifting focus on the scope conditions. Furthermore, the revised model still fails to explain the scenario of stagnation i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is review believes that a more nuanced reflection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could help shed light on the reality of compliance gap.

KEYWORDS: spiral model, compliance gap, scope condition, human rights politics.

*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